

# 發憤以抒情： 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

陳 岸 峰\*

## 摘 要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間，正當新文學運動已取得相當的成就，而胡適又以其《白話文學史》為主導，意在重構中國文學史之際，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以逆向的姿態，作出抗衡論述。本文從錢氏有關「文學」與「文學史觀」的探討出發，落實至審視其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實踐。我們發現，錢氏在實踐中睽離了自己所懸舉的文學史理想。然而，本文所要揭示的並非其文學史理想能否實踐，而在於體味在新文學運動如日中天之際，一代舊文人面對社會、文化與傳統價值之轉變所流露的悲憤心態；同樣重要的是，藉此研究我們得以瞭解作為傳統文人的錢氏與新文學運動陣營者的不同立場之根本所在。

關鍵詞：新文學運動、白話文、古典文學、文學史、錢基博

## 一、前 言

清末民初，乃新、舊交替的時代。所謂的「交替」，絕非和平的轉移，而是政局動盪、民不聊生。在文壇上，新、舊勢力之間的角力亦相當熾烈。新勢力者，乃以胡適（適之，1891-1962）、陳獨秀（仲甫，1879-1942）等為首，領袖群倫，掀起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倡白話文之寫作，引介「德

---

\* 作者係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候選人。

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高舉「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values)<sup>1</sup>之旗幟，舉世蹈奮，景從者眾。然而，在高蹈的文學史表象背後，卻有以陳三立(伯嚴，1853-1937)與鄭孝胥(蘇堪，1860-1938)等人為首的晚清宋詩派，<sup>2</sup>以林紓(群玉，1852-1924)為首的桐城古文派<sup>3</sup>以及其他舊文人，仍從事古典文學創作。此派中人，亦即與胡、陳等文壇新勢力相頡頏的舊勢力代表。彼等以遺老自居，目睹政治之衰頹、傳統價值之崩潰而彷徨愁苦。然而，隨著桐城派的林紓死於1924年，宋詩派的陳三立與鄭孝胥分別死於1937與1938年，舊勢力日漸凋零，對新勢力不復存在威脅。相對而言，新文學運動的作家群，則活躍文壇，努力促使白話文創作成為主流。雖則新、舊兩派實力懸殊，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漠視或忽略舊勢力的聲音。可惜，一般文學史卻往往作出了無意的忽略或有意的壓抑，為我們提供一種新勢力一舉打倒舊勢力的摧枯拉朽式的態勢；絕大部分的「現代文學史」中，均不曾詳細論述當時的古典文學創作，<sup>4</sup>亦甚少提及傳統文人學者對新文學運動所表達的異議，除了往往不忘提及被視為古文學而垂死掙扎的林紓所演出的鬧劇及所謂「復古派」的攻擊。<sup>5</sup>

- 
- 1 見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第1集，頁728。
  - 2 清末陳三立與鄭孝胥等人所領導的宋詩派亦稱「同光體」，據陳衍《石遺室詩話》所言，「同光體」之得名乃鄭孝胥與陳衍等人對同治、光緒以來「不專宗盛唐者」的戲稱。而當時的另一派乃以王闓運為首的「湖湘派」，追隨者有蔡毓春、鄧輔綸、鄧繹、李壽蓉、龍汝霖等人，主張復古，他們的詩則學漢魏六朝及初盛唐。有關同光體與湖湘派的論述，可參閱馬衛中，《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198-249、250-326。
  - 3 關於清末民初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及林紓等的桐城派古文的相關論述，可參閱：周中明，《桐城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373-394。
  - 4 例如：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94)。
  - 5 例如黃修己便以「封建守舊派」、「復古派」描述林紓與《學衡》、《甲寅》等抗衡新文學陣營的文人，然卻沒有讓這批人物「發聲」。由此可見，黃氏及其他類似的文學史中對抗衡新文學陣營的舊文人的這種書寫方法對文學史真象的壓抑與暴力，而這種暴力與壓抑卻往往乃源自蹈襲前人舊說，而未能客觀深入作研究。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頁37-39、200-204。這類以「復古」的字眼形容《學衡》、《甲寅》中人的「傳統」，同樣可見於如下的文學史：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實際上，新文學運動並非在1919年之後便一舉統佔文壇，而是經由教育部於1920年頒定白話文為小學的國語教育，從而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從小學、中學至師範均自願或不得不採用國語，原因誠如胡適所言：「教育制度是上下連接的」；<sup>6</sup>及至民國九、十年（1920-1921），「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sup>7</sup>。1921年，胡適應教育部之邀，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講「國語文學史」。其後，胡適便依據這一底本，在不同的學校演講，而有不同的油印本流行。<sup>8</sup>經過他多次修改後，終於在1928年出版了《白話文學史》。這是第一部從「白話」角度撰寫的文學史，為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這並不表示白話文從此便全然確立，新文學運動便徹底取得勝利，而反對的聲音亦就此斷絕。相反地，白話文創作與新文學運動的成功是要再經過相當長時間與舊文學的鬥（論）爭之後，才逐漸成為「正宗」的。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本文所要討論的錢基博（子泉，1887-1957）自稱立意為現代文人而作的「懺悔錄」——《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既能呈現在新文學運動如日中天之際，一代舊文人面對社會、文化與傳統價值之急速轉變所流露的悲憤心態，復可助我們透視在當時文壇新、舊兩派不同立場之根本所在。

## 二、錢基博生平及其文學旨趣述略

錢基博的價值觀與文學趣向對其治學有很大的影響，故此我們有必要對其生平與文學志趣有所瞭解，以資理解《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

目前可見的有關錢基博生平事蹟的資料中，有他自己所撰寫的〈錢基博

---

社，1998），第1冊，頁81-94；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上冊，頁63-69。

6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57。

7 同上註，頁158。近人李澤厚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明顯的成功和確定不移的果實是白話文的勝利。」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下冊，頁867。

8 有關從「國語文學史」至《白話文學史》的過程，詳見胡適，〈自序〉，《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文化出版社，1996），頁1-10。

自傳)、其門人吳忠匡所撰的〈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以及傅道彬的〈錢基博先生小傳〉<sup>9</sup>三篇文章；此外，近人孔慶茂《丹桂堂前：錢鍾書家族文化史》一書，對錢基博的一生由童年至晚年都略有介紹，<sup>10</sup>頗值得參考。然而，傅氏之文與孔氏一書對錢氏生平與學術之介紹，均不出錢氏與吳氏兩文之範圍，故以下且以錢氏之自傳與吳氏之記述為論述重心。

錢氏之自傳側重於個人品格與學術趣向；至於吳忠匡一文，則對其師之學問作出頗為詳細的描述。從吳氏的介紹中，我們得知錢氏乃由早年短暫的幕僚生涯，繼而轉為下半生的從事教育事業。<sup>11</sup>錢氏自述，他自小便受傳統學問的教育，九歲已讀完《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古文翼》，且皆能背誦。十歲時，他便由伯父仲眉公教為策論，課以熟讀《史記》、諸氏唐宋八家文選；尤為喜歡讀史，自十三歲便讀司馬光（君實，1019-1083）《資治通鑑》、畢沅（秋帆，1730-1797）《續通鑑》，且圈點了七遍。<sup>12</sup>故此，他對於「史」的性質，有其獨特見解，絕非偶然。而他對自己早年博通經史子集以至於個人著述，亦頗為自詡。當時名人如陶大均、曾廣鈞（重伯，1866-1929）、張謇（季直，1853-1926）及費樹蔚等人均對其學問文章甚為推崇，許以「大江以北，未見其倫」、<sup>13</sup>「豈惟江北，即江南寧復有第二手」之譽；<sup>14</sup>而他則自詡「集部之學，海內罕對」。<sup>15</sup>錢氏又曾自題楹聯云：「書非三代兩漢不讀，未為大雅；文在桐城陽湖之外，別闢一途。」<sup>16</sup>其於文章之自信，可見一斑。至於錢氏之為人，則素以儒家「君子」自重，事親以孝，待人以義。文中均有所介紹，在此不贅。

9 傅道彬，〈錢基博先生小傳〉，見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頁1-4。

10 第1章「二十世紀初的時代與家庭」中對錢基博的童年至青年的求學過程與第2章第2節的「古文名家錢基博」尤值得參考。詳見孔慶茂，《丹桂堂前》（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頁3-20、32-40。

11 吳忠匡，〈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中國文化》1991.4：190。

12 見錢基博著，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頁932。

13 張謇語。同上註，頁935。

14 費樹蔚語。同上註，頁935。

15 同上註，頁934。

16 同上註，頁937。

由錢氏的自傳以及其弟子的文章可見，錢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服膺並實踐傳統中國道德文化，可謂乃一典型的傳統中國文人學者。而這種傳統的思想則完全體現於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之中。

### 三、文、文學、文學史

在未進入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的內容之前，先讓我們瞭解錢基博對「文」、「文學」與「文學史」的定義，好讓我們依其定義、循其思路，藉此以理解這本文學史的敘述架構與具體內容。

首先，他綜合多種經典而對於「文」有如下定義：「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sup>17</sup>至於「文學」，則分為「狹義的文學」與「廣義的文學」。他所謂的「狹義的文學」乃專指「美的文學」而言：

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弦誦，可以動欣賞。……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倘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sup>18</sup>

「狹義的文學」與「廣義的文學」之區分乃以六朝為界，以韻文為「狹義的文學」；至於「廣義的文學」，則乃泛指一切非韻文的著述總稱，包括「論辯」、「序跋」、「傳記」，即其所謂「偏於發智者」，至於「偏於抒情」的，則有「詩歌」、「戲曲」與「小說」。<sup>19</sup>至於他認為「廣義的文學」乃「文學之平民化」，大概是受當時的文藝思潮所影響，亦乃此書之取向，詳情稍後再論。

關於「文學史」與文學之別以及兩者之功能，錢氏有如下闡述：

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為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的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

17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1。

18 同上註，頁2-3。

19 同上註，頁3。

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為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為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sup>20</sup>

以上引文有兩點值得注意：1.文學史之為「史」者，貴在客觀的記載，而文學則貴在抒寫情志之主觀；2.他認為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而文學則重抒情達意。重要的是，他認為前者「不如」後者，因為前者乃科學，而後者乃創作。依其判價，文學創作乃高於文學史的書寫。

基於以上的定義，他認為司馬遷（子長，約前145或135-前87）的《史記》與胡適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史〉並非文學史。原因在於前者乃「發憤之作」、「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即是說司馬遷在記事上仍具「史」的特性，可是整體上偏向於抒情；至於胡適該文，則因為「褒彈古今」、「好為議論」、「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故亦被劃為非文學史之列。<sup>21</sup>他重申，「史之所以為貴」，在於記實；而著者之成見，則「史之所大忌」。他又補充：

……蓋文學史者，文學作業之記載也；所重者，在綜貫百家，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在記載文學作業，而不在鋪敘文學家之履歷。文學家之履歷，雖或可借為考證之資，歐西批評文學家嘗言：「人種、環境、時代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種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質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捨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幾於買櫝還珠矣。<sup>22</sup>

最後一句關於文學史與文學著作的評價，足證上述所言，即他認為主觀的文學創作乃高於客觀的文學史書寫。至於他所謂以人種、環境與時代構成藝術三要素的歐西批評家，指的應是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泰納從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立場出發，提出文學研究與批評必須注意決定文學形成的三種因素，即種族、環境與時代。這種觀念乃重視寫實的、社會學的文學觀，進而為文學指定一種可以認識與改造社會的

20 同上註，頁4-5。

21 同上註，頁4-5。

22 同上註，頁5-6。

功用。<sup>23</sup> 泰納的觀點對五四時代的文學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其中尤以茅盾（沈雁冰，1896-1981）與周作人（櫛壽，1885-1967）兩位為甚。錢氏亦乃受其影響者之一，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之側重環境與時代，或許便是受泰納之影響。

總而言之，錢氏強調的是直接的閱讀文學作品，再參閱作家的履歷；而論述的方法，則在於「綜貫百家」，以達至「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的目的。然而，在錢氏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其研究的方法恰恰與上述所提倡的方法背道而馳，大多乃鋪敘作家的履歷與時代背景，而關於作品的討論相對地少，特別是「新文學」作品。我們必須對錢氏的文學史觀有一番認識，方能解答上述其文學史中所存在的這種重作家履歷與時代背景，而又幾乎不提及「新文學」作品的問題。

#### 四、文學史觀：「返本修古」與「有往必復」

在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中，新、舊文學所佔的篇幅在比例上極為懸殊，「新文學」作家只有寥寥數人，與陣營龐大的古文學家相比，可謂黯然失色。至於少數新文學作家中，只有胡適、魯迅（豫才，1881-1936）與徐志摩（櫛森，1896-1931）作專門討論。此外，書中也偶爾提及周作人、郭沫若（1892-1978）與郁達夫（1896-1945）等人。此等作家算是現在公認的「新文學」作家。而同樣被置於「新文學」中的梁啟超（卓如，1873-1929），則乃介乎新、舊之間而啓新文學之風者，並不能算是新文學作家。至於同列中的康有為（廣廈，1858-1927）、簡朝亮（季紀，1851-1933）、徐勤、陳千秋、譚嗣同（復生，1865-1898）、嚴復（又陵，1854-1921）、章士釗（行嚴，1881-1973）與黃遠庸這些以文言文創作的人物，根本與「新文學」作家風馬牛不相及。再就其「新文學」一編的論述而言，對新文學發展的真正描述只是止於「白話文」一節；而且，在這不到三十頁的篇幅中，多是對作者生平的描寫與攻擊。錢基博否定新文學運動之態度，昭然若揭。

---

23 詳參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03-104。

從《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中的篇幅安排，以至其對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之攻擊，我們可以清楚得見錢氏在新、舊文學上之偏向。以下，我們可從錢氏另一本文學史——《中國文學史》中的一段話，對其文學史觀作更進一步的發掘：

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談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而文則奧博排纂，力追秦漢，以矯歐、蘇、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劉基駢駘開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詩則雄邁高亮，出入漢、魏、盛唐，以救宋詩之粗硬，革元風之纖濃；而高啓、李東陽後先繼軌，以為何、李、王、李開山。<sup>24</sup>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斷言，錢氏所持的便是「崇古」的文學史觀，可謂追跡明代前、後七子的「詩必盛唐，文必秦漢」<sup>25</sup>的文學理念。後世對明代前、後七子的評價，除了明末清初的少數文人學者之外，實際上是譏多於譽。至於八股文，則更是眾矢之的，然而錢氏卻獨闢眾議，大力褒揚：

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軼蕩，則以古文為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復古一也。……不知明有何李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以救漢、魏、六朝之孱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sup>26</sup>

錢氏對以唐順之（應德，1507-1560）與歸有光（熙甫，1506-1571）為首的「唐宋派」的八股文成就雖難得地予以肯定，然而他又認為若較諸前、後七子，唐、歸二人只能如唐代的裴度（中立，765-839）、段文昌（墨卿，773-835）之於一代正宗的韓愈（退之，768-824）與柳宗元（子厚，773-

24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下冊，頁845。

25 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86，頁7348。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自己曾這樣說：「西京（西漢）之後，作者勿聞矣。」見李夢陽，〈論學（上篇第五）〉，《空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66，頁602。另一領袖何景明在〈海叟詩序〉中說：「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李白、杜甫），旁及初盛唐諸人，而古作者必從漢、魏求之。」見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117。康海則說他們七子中人：「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魏晉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見康海，〈漢陂先生集序〉，《對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第1冊，卷3，頁40。

26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下冊，頁845。

819)。正偏之別，可見一斑。新文學與古典文學兩者的正偏之別，主次之分，亦正在此。

再就上述引文中其「返本修古」與「有往必復」的文學史觀而言，文學史是循環的，亦即是說，文學的復古是可以預期的。由此我們便不難明白錢氏何以於「現代」的文學史中以「魏晉文」冠其首，以桐城派古文附其後，再以「中唐詩」、「宋詩」、「詞」、「曲」充撐了整本《現代文學史》，而以其「新文學」綴其末，顯然對於在三十年代已成就斐然的新文學不屑一顧。

其實，錢基博對於新文學運動在不同時期的態度有所不同，而且其轉變之幅度相當大。以下將從《現代中國文學》的初版與增訂版在內容上與觀點之截然不同處作分析，以觀其對新文學態度之轉變，以及其攻擊焦點與意圖之所在。

## 五、錢基博對新文學運動態度之轉變

### (一)《現代中國文學史》版本異同比較

#### 1. 版本述略

由劉夢溪主編、傅道杉編校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對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的版本源流有如下「說明」：

本書原由無錫國專學生會於1932年集資排版。時先生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並兼任無錫國專教授。1932年9月由上海世界書局正式出版；1934年、1935年連續再版，1936年增訂出版；1974年收入臺灣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刊》中。1986年由岳麓書社據1936年增訂版改版印行，改版時由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石聲淮教授校訂。此次整理以岳麓書社1986年版為底本。<sup>27</sup>

其實，《現代中國文學史》最早乃由無錫國專學生會於1932年集資排版，原書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sup>28</sup>此書的初版日期並非如《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所說的1932年9月，而是中華民國22年8月，亦即1933

27 錢基博著，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頁3。

28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507。

年8月，由上海的世界書局出版，及至民國24年（1935）2月，已出了三版。<sup>29</sup>《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中對此書初版日期所犯之錯誤，大概亦乃源於沿襲1986年岳麓書社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出版說明」的錯誤記載所致。<sup>30</sup>此書於1934年、1935年連續再版，1936年增訂出版；1974年此書被收入臺灣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刊》中；1986年由岳麓書社據1936年增訂版改版印行，改版時由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石聲淮教授校訂；1965年香港龍門書店重印了其增訂版；此書由岳麓書社於1986年重排；1989年上海書店將此書與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及陳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合為一書出版；<sup>31</sup>1996年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收入「現代學術經典」叢書。

## 2. 增訂內容：「原書所未及三事」

錢基博在三十年代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為世人提供了一幅另類的「現代文學史」圖像。他在此書的〈四版增訂識語〉中指出增訂版「有鄭重申敘，而為原書所未及者三事」：1. 將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的非周薄孔的言行上溯至王闈運（壬秋，1833-1916）、廖平（季平，1852-1932）、吳虞（又陵，1872-1949）、康有為與梁啟超這一脈中；2. 指出晚清的桐城派乃由非桐城範圍作家所撐拄；3. 指出以陳三立、鄭孝胥為代表的同光體乃嬗衍自桐城派的姚鼐（姬傳，1732-1815）。<sup>32</sup>增訂版據錢氏自述，「材料增十之四，改竄及十之五」，<sup>33</sup>而大篇幅地鞭撻梁啟超、胡適以及新文學運動，則乃其重心所在。值得關注的是，在增訂版中，他增添以上三項為原書所未道及之事，究竟意欲何為？

29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8月初版，1935年2月3版），背頁出版資料。筆者所據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圖書館藏書。

30 見錢基博，「出版說明」，《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1。犯同樣錯誤的包括吳忠匡，〈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中國文化》1991.4: 193；孔慶茂，〈丹桂堂前〉，頁38；吉平平、黃曉雯，《中國文學史著作版本概覽》（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頁231。

31 吳文祺、陳炳堃、錢基博，《新文學概要·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

32 錢基博，〈四版增訂識語〉，《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509-510。

33 同上註，頁509。

上述三個問題，除了第二個關於桐城派作家之地域問題應無可議之外，第一與第三個問題均有其特定目的。先處理第一個問題。依其言，我們可得知他乃將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上溯至王闈運、廖平、吳虞、康有為與梁啟超非周薄孔這一脈。其中，錢氏借吳虞之口對這批人物的操守作出猛烈的攻擊，<sup>34</sup>除了王闈運之外，後世稱之為大師或革命先驅的這批人物，在錢氏筆下，全部淪為丑角，幾乎無一倖免。而此等為錢氏所攻擊的人物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均為反傳統的人物。由此可見，《現代中國文學史》所處理的除了文學之外，還包括超乎文學以外的課題，故此有不少論者稱此書並非純粹的文學史，相當中肯。至於第三項所提及的以陳三立、鄭孝胥為代表的同光體乃衍生自桐城派的姚鼐，更是值得商榷。其實，同光體既以宋詩為學習方向，最直接的便是學江西詩派，甚至上溯杜甫（子美，712-770）與韓愈，即使在理念上與桐城派偶有相同，亦不表示同光體乃自「姚鼐嬗衍而來」。<sup>35</sup>

以下我們再看一段文字，即可對錢氏所增訂的方向與意圖有多一份瞭解：

民國肇造，國體更新；而文學亦言革命，與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學，亦既如荼如火，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而歐洲思潮又適以時澎湃東漸；入主出奴，聚訟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權而為論，其弊有二：一曰執古，一曰驚外。何以驚外？歐化之東，淺識或自菲薄，衡政論學，必準諸歐；文學有作，勢亦從同，以為「歐美之學，不異話言，家喻戶曉，故平民化。太炎、畏廬，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則，出於爾雅；若衡諸歐，嫌非平民。」又謂：「西洋文學，詩歌、小說、戲劇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稱文宗焉；倘準則於歐美，當擯不與斯文。」如斯之類，今之所謂美談；它無謬巧，不過輕其家丘，震驚歐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異則，民生異俗，文學之作，根於民性；歐亞別俗，寧可

34 同上註，頁 68-69。

35 例如有關於晚清宋詩派的研究者楊揚便不曾提及同光體乃衍生自桐城派，見楊揚，〈晚清宋詩運動與「五四」新文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 (1999): 215。吳淑鈿雖認為宋詩派在詩論上受桐城派的「啓導」，但卻說：「整體而言，我們很難說桐城派是近代宋詩派理論的淵源……。」見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 51。

強同？李戴張冠，世俗知笑；國文準歐，視此何異。必以歐衡，以諸削足；履則適矣，足削為病。茲之為弊，諛曰「驚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歸、方以不祧，鄙劇曲為下里，徒示不廣，無當大雅。茲之為弊，諛曰「執古」。<sup>36</sup>

錢氏所抨擊的「執古」與「驚外」的兩種極端現象，實際所指的是胡適等新文學運動領導者與當時擁護舊文學者之間的角力、論戰。

在胡適的〈文學的改良運動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中，他們共設立了三個攻擊的靶子：桐城派、駢文體和江西詩派。陳獨秀在其〈文學革命論〉中對駢文、桐城古文與江西詩派則有如下抨擊：

東晉而後，即細事陳啓，亦尚駢麗。演至有唐，遂成駢體。詩之有律、文之有駢，皆發源於南北朝、大成於唐代。更進而為排律為四六。此等雕琢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學，極其長技，不過如塗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視八股試帖之價值，未必能高幾何，可謂為文學之末運矣。

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sup>37</sup>

陳獨秀甚至稱「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有光〕方〔苞〕劉〔大櫨〕姚〔鼐〕」為「十八妖魔」，<sup>38</sup> 攻擊的是彼等之「尊古蔑今，咬文嚼字」。<sup>39</sup> 以上攻擊的便計有以林紓為首的桐城派與以陳三立、鄭孝胥為首的宋詩派。<sup>40</sup> 至於胡適，在其〈文學改良芻議〉、〈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歷史的文學觀念〉等文章中，他側重強調晚清宋詩派的消極影響，甚至將它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對立面來理解。他便曾這樣批評陳三立與鄭孝胥：

陳三立是近代宋詩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詩》裡實在很少可以獨立的詩。近代的作家中，鄭孝胥雖然也不脫模仿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還不

36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8-9。

37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第1卷，上冊，頁21-22。

38 同上註，頁22。

39 同上註，頁22。

40 參閱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76。

是模仿。<sup>41</sup>

胡適指出宋詩派志在學古，故也不將他們算在那五十年之內。

在這場新、舊文學的論戰之中，兩派之陣容極為懸殊，為舊文學辯護而又為人熟知的，大概只有林紓以及以吳宓（雨僧，1894-1978）、梅光迪（覲莊，1890-1945）以及胡先驌（步曾，1894-1968）為主的《學衡》諸君；至於新文學運動陣營中人，既是人多勢眾，且態度激烈。當時，錢玄同（復，1887-1939）高呼「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攻擊的是桐城派的古文與駢文一脈，而其主要的對象乃是桐城派的末代宗師——林紓，而非章太炎（枚叔，1869-1963）所提倡的六朝文。據陳平原之見，六朝文之所以沒有受到如桐城派之備受攻擊，乃是倡六朝文者乃章太炎，而他便是新文學運動中人如錢玄同與周氏兄弟的老師，故而有同門不相鬥的默契。<sup>42</sup> 至於林紓本人雖曾自辯自己並沒有門派，然而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吳汝綸，臨終前則曾有桐城一脈盡在林紓之意。而且，林紓本人在當時以古文大量翻譯西方名著，炙手可熱，成為錢玄同、胡適等新文學運動者的攻擊對象，亦乃勢所難免。況且，民國之後，本由桐城派（馬其昶、姚永概等）所控制的北京大學國文系，盡為章太炎之弟子如黃侃（季剛，1886-1936），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所取代，<sup>43</sup> 其中除了黃侃之外，其他幾乎全是新文學運動陣營中人，再加上激進的陳獨秀與胡適的搖旗吶喊、大肆攻擊，桐城派人士自不免有被驅逐的感覺。林紓於是不得不挺身而出，質疑新文學運動以至醜化其領導人物。新、舊文學之爭，至此而臻白熱化。

錢氏雖則「執古」與「驚外」並斥，所論亦言之成理。然而，展開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的目錄，我們難免大吃一驚。因為，他所謂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卻是以清末至民初的舊文學作家，即他所謂的「執古」者為主，差不多佔了八成的篇幅；至於「驚外」者的新文學中人，竟由康有為冠其首，其弟子梁啟超居其次，稱之為「新民體」；復有「邏輯文」，標舉的是嚴復與章士釗；最重要的新文學運動領導者與實踐者的胡適則敬陪末座。至於以小說名世的魯迅與新詩健將的徐志摩則更是附錄於胡氏一節之下。無論

41 胡適著，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123。

42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384。

43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491。

是直接「驚外」派的攻擊，還是爲之勾勒出「非周薄孔」的一條線索，以至於增補了桐城派與宋詩派的詳細討論，均意在「執古」與「驚外」的文壇爭奪戰中爲前者壯聲勢，並將新文學的意識形態定爲「非周薄孔」的叛逆性質。一言以蔽之，增訂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之矛頭所向，均是對新文學運動不同方面的攻擊，亦是對舊文學的有力支持。

### 3. 刻意攻擊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

據錢基博自述，《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始民國六年，積十餘歲」<sup>44</sup>而成。自此書出版後，友儕紛紛來信討論、切磋，胡先驥與郭斌佳也於報上有批評、介紹此書的文章。據說，兩君對此書「獎勸交至」。<sup>45</sup>其中，胡先驥曾是胡適之好友，而他則非常質疑新文學運動以及以白話創作，曾作二萬多字的長文批評胡適的《嘗試集》以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sup>46</sup>更與梅光迪以及吳宓辦《學衡》以抗衡新文學運動，<sup>47</sup>當然是錢基博的同道了。我們或可藉此而推測，在1936年再版前，錢氏便可能在初稿加上後來他與朋輩間尤其是學衡派中人的討論成果，於當年的5月20日至7月11日期間，以一個月又二十二日的時間，對原著作「材料增十之四，改竄及十之五」的大規模改寫。此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在民初的新、舊文學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兩個關鍵人物胡適與林紓的極不尋常的重寫。至於其他文學家的增入與對原有代表作家評論的重寫，大抵只求更爲翔實與全面而已，與原來的版本並沒有根本上的分別。現依次序述其原著與增訂版對胡適與林紓兩人之極不尋常的重寫，以觀其對桐城派與白話文學運動之態度的轉變。

錢基博與林紓之間素有宿怨。據錢基博在其〈錢基博自傳〉中所言，林紓當時乃文壇宗主，因見錢基博文章駸駸然有蓋其名之勢，故而欲使商務書

44 同上註，頁507。

45 同上註，頁509。

46 胡先驥，〈評《嘗試集》〉、〈評《嘗試集》（續）〉、〈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孫尙揚、郭蘭芳編，《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頁292-311、312-328、329-350。

47 相關的論述可參閱樂黛雲，〈重估《學衡》——兼論現代保守主義〉；郭齊勇，〈試論「五四」與「後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分別見劉青峰編，《歷史的反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265-275、243-264。另可參閱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

店勿刊行其書。其後，林紓更以卑劣手段致使錢氏無法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然而錢氏聲言，他並不計較個人恩怨，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仍給予林紓客觀的評價。事實上，錢氏確如其所言，只是在桐城派作家的排名次序上略作調動而已，在增訂版中將本來先於馬其昶（通伯，1855-1930）、姚永樸（仲實，1862-1939）與姚永概（叔節，1866-1923）之前的林紓置於最後。這大概是將之視為桐城派的殿軍人物，亦合乎其文學史的實際地位，並無貶抑之意。更且，在1935年增訂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錢氏更加插了「天性敦摯」一詞形容林紓，並敘述林紓十歲時以家中之米接濟其師薛錫極的事跡，立意在印證、推崇林紓之敦摯本性。至於對林紓之致書蔡元培以攻擊北京大學為新文學基地的不滿，以及其以《妖夢》、《荊生》諸小說攻擊新文學陣營中的陳獨秀、錢玄同與胡適，錢氏則大篇幅地列出，不亦是表示支持嗎？而且他又在增訂版中，將原本關於胡適有關新文學革命的內容全部刪掉。這樣的比較之下，錢氏反新文學運動的立場便非常明顯了。

然而，錢基博在初版與增訂版對胡適的記載以及對由胡氏所倡導的白話文學運動的評價，則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其對胡適以至於白話文學運動之鞭撻，近乎黨同伐異。在初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錢基博對胡適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及胡適自美洲畢所學而歸，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其友人陳獨秀誦其說而張之，以其長大學文科，銳意於意大利文藝改革之事也！登高之呼，薄海風動駁駁乎白話篡文言之統，而與代興為文章之宗焉。<sup>48</sup>

就以上文字觀之，不但沒有任何詆譏攻擊之跡象，而且似乎頗有肯定之意。例如，他跟著便以差不多十四頁紙<sup>49</sup>的大篇幅引錄胡適有關白話文學運動的文章與日記，約佔「胡適附黃遠庸」這一節<sup>50</sup>的一半篇幅以上。據其言，乃藉此「可以闕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歷程」。<sup>51</sup> 錢氏對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文學革命之肯定又可見於其在1924年出版的《國學必讀》一書中，其中他便收錄了胡適的四篇文章，分別是：〈文學改良芻議〉、〈談新詩〉、〈論短篇小

48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35年版），頁427。

49 同上註，頁427-441。

50 同上註，頁424-449。

51 同上註，頁441。

說)、〈國語文法概論〉<sup>52</sup>以及〈諸子不出於王官論〉。<sup>53</sup>胡適的這五篇文章，前四篇全是屬於倡導新文學的。然而，錢氏卻將之收入「國學」的「必讀」之列。而且，他又在該書的〈作者錄〉中這樣介紹胡適：

一面倡建設的文學革命之論，而以國語的文學，打倒桐城派古文之舊勢力；一面又主張整理國故之議，以刷新國學之面目。其於中國學術摧陷廓清之功，信不可沒！惟其衡評國學，過重知識論；而功利之見太深，此其所短！<sup>54</sup>

由以上文字可見，他當時對胡適以及其所倡導的新文學運動並未有任何惡感，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頗為認同。

然而，在增訂版《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錢氏完全刪去對胡適提倡新文學之成就頗為肯定的這重要一段。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初版中引錄胡適接近十四頁的文學革命主張，大幅度地壓縮為不到一頁，而且只以列點的形式略作介紹而已。雖然，他在初版中論述胡適的後面對他亦不無貶抑之意，稱其過為「武譎」，即「尚詐取，貴詭獲」，<sup>55</sup>抨擊胡適及其同儕誤導後生小子。且在結束之前，藉當時的新青年之口而譏胡適之倡重整國故之論為「落伍」，並有如下悻悻然的慨嘆：

十年推排，已成老物；身名寂寞，胡適蓋不勝今昔之感！而逐林紆之後塵，以為後生揶揄云！又豈適始計之所及者也哉！<sup>56</sup>

錢氏在初版本對胡適的批評與揶揄，相較增訂本而言，尚算輕微；而他對白話文學運動，也不見有任何過激的大肆攻擊。然而，在1936年的增訂版中，胡適及其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在錢氏眼中驟然變成了偽君子與洪水猛獸。錢氏無所不用其極地對胡適作出挖苦、嘲弄，甚至於長篇累牘地引用他人（主要是章士釗）文字，對胡適與新文學運動作出徹底的攻擊。

《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版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錢氏對胡適《嘗試集》所作

52 見錢基博編，《國學必讀》（上海：中華書局，1924），上冊，頁158-260。

53 同上註，下冊，頁409-416。

54 同上註，上冊，頁8。

55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版），頁447。

56 同上註，頁449。

的挖苦與批評。<sup>57</sup> 錢基博於《嘗試集》中「錄一二篇以見一斑」，並非隨意引錄，而是引錄胡適的〈病中得冬秀書〉與〈新婚〉這兩首「由有韻而無韻」、「長短隨意」的作品，以便其嘲弄與揶揄，以證以白話寫詩之難以成功。至於胡適的《嘗試集》中有否值得肯定的作品，則隻字不提。

錢氏又指出，胡適以為讀古書的方法只有一途「即用清代漢學家之校勘訓詁方法，以求本子之訂正與古義之考定」，<sup>58</sup> 其用意亦在揭穿胡適所謂的「科學方法」，其實也不過是清代的樸學而已。至於胡適一方面力倡使用白話文，然另一方面卻又自相矛盾地倡整理國故，<sup>59</sup> 自然又是其言行不一的罪證了。又借章士釗之言攻擊新文學運動，其出發點其實也就是林紓的「古文不當廢」的觀點。錢氏從論證古文之簡潔，白話之繁蕪，進而引伸至創作思維上優劣。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以白話文創作乃「文化瀕於破產，中國人且失其所以為中國人而不自知」，<sup>60</sup> 而造成此厄運的罪魁禍首，便是胡適。

最能表達出錢氏心聲的莫過於以下的一段文字，足證其發憤著書的心態：

語其表也，似天下之論已歸於一；至語其裡，則不少學者少數人發縱指示，強令天下之學者，自默焉屈於己而已。如金在治，不躍為常；復假定天下之學者，自默屈於己外，無他道而已。為問此默而屈者，其將與之終古否乎？與之終古，中國之文化也將至何境矣乎？四五年來，自非無目，莫不見倫紀之凌夷，文事之傾落，如水就下、獸走壙，日蹙千里而未艾也。<sup>61</sup>

由此可見，錢氏便是不甘「默屈」，不忍見中國文化就此沉淪於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其著書乃代千千萬萬默屈的學者發聲，以抒其對當時「倫紀之凌夷，文事之傾落」現象的不滿與擔憂。至於新文學作品，在章氏以至於錢氏眼中，不外「淫情濫緒」<sup>62</sup> 而已，當然不獲其青睞了。

以上論述，旨在印證錢氏悲憤之心態與全方位對新文學運動的攻擊。他

---

57 同上註，頁 485-486。

58 同上註，頁 502。

59 同上註，頁 475、492。

60 同上註，頁 476。

61 同上註，頁 472-473。

62 同上註，頁 474。

對古文與白話的性質的分析，雖不乏洞見，但若將傳統價值之崩潰與社會之紛亂，全歸咎於新文學運動與白話文創作，均是倒果為因。整體而言，多為激憤之語，而且其中夾雜過多的人身攻擊。其嚴厲控訴，並不客觀，實不符胡適與梁啟超二人對當時社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sup>63</sup>

## (二) 有關魯迅、徐志摩以及其他新文學作家的評價

在錢基博的視野中，魯迅與徐志摩並非獨當一面的作家，而是「景附」胡適而「有大名者」。錢氏又認為：

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志摩華靡，何當於民眾。志摩沉溺小己之享樂，漠視民之慘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抒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中，何嘗有民眾耶！<sup>64</sup>

在此，錢氏將魯迅與徐志摩等量齊觀，評為「資產階級文學」。錢氏之引用「資產階級文學」、「唯心」、「唯物」等術語，以及「小己」與「民眾」對立的思維，應是從報章上全部照錄不誤，而不問這些概念是否與自己的文學觀有所衝突。我們再看一段他所錄的文字，大抵可知他當時所受的影響來自何方：

若漸由小己而轉向民眾以為青年所推者，曰郭沫若、郁達夫。郭沫若代表青年抵抗一派；郁達夫代表頹廢一派；而其所以可貴，則要在意趣之轉向勞動階級。而於是所謂新文藝之新而又新者，蓋莫如第四階級之文藝，諡之曰普

63 有關胡適對傳統的批判的肯定論述極多，在此只略舉一二。例如周策縱，〈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見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頁319-224；羅志田，〈新舊文明過渡之使命：胡適反傳統思想的民族主義關懷〉，《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6: 72-79；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pp. 166-187. 至於有關梁啟超的啟蒙思想及其鼓吹革命的動機，可參閱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尤其是第2章第3節「新民、破壞、革命」中對梁氏「排滿以興民國」以及「破壞以建民國」的論述，正好回應錢基博對梁啟超缺乏理解的指責；有關梁啟超個人的政治與對待傳統的態度以及其新民說的論述，可參閱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20-237 & 272-295.

64 同註55，頁504。

羅文學，其精神則憤怒抗進，其文章則震動咆哮，以唯物主義樹骨幹，以階級鬥爭奠基石，急言極論，即此可徵新文藝之極左傾。而周樹人、徐志摩，則以文藝之右傾，而失熱血青年之望。<sup>65</sup>

這裡推崇的是郭沫若與郁達夫，乃當時創造社的主要成員與作家。郭沫若屬於「抵抗一派」，自不在批評之列。就算是與魯迅一樣，同是「頹廢」的作家郁達夫，在錢氏眼中則因為其「意趣之轉向勞動階級」而屬「可貴」。至於其所列舉的「第四階級之文藝」（「普羅文學」）、「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左傾」、「右傾」等口號與思維，實則全乃受自當時「關於無產階級文學論爭」以及「左聯」的影響。<sup>66</sup>所謂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論爭」，指的是以郭沫若、郁達夫與成仿吾（1897-1984）等人為主的創造社與以錢杏邨（阿英，1900-1977）、馮乃超（1901-1983）為主的太陽社，在魯迅未加入彼左派陣營前對魯迅的攻擊。<sup>67</sup>無論是創造社，還是太陽社，他們都提倡革命文學，提出文學作品應該：「反抗一切舊勢力」、「反個人主義」、「它的主人翁應當是群眾，而不是個人；它的傾向應當是集體主義」、「要以真摯之情去描寫『農工大眾的激烈的悲憤，英勇的行爲與勝利的歡喜』。」<sup>68</sup>這不就正是錢基博所引用以攻擊魯迅與徐志摩兩人的缺失之所在嗎？

錢氏《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初版於1933年出版，然而自1928年開始，魯迅已開始注意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著作，並於同年6月譯介蘇聯的《文藝政策》在他所主編的《奔流》上連載。<sup>69</sup>而於1930年，魯迅已與左翼人士達成共識，於該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聯盟」。自此，魯迅雖非共產黨黨員，但它實際上已成爲共產黨所控制的宣傳喉舌的一位重要人物。及至1935年，《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出版的前夕，錢氏所謂「右派」、「頹廢」的魯迅所屬的「左聯」已因受國民黨的壓力而自動解散。由此可見，錢氏對魯迅的實際傾向並不太瞭解，只是不自覺地引錄了報章上派系衝突的

65 同註55，頁505。

66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頁223。

67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194。

68 原出自蔣光慈，〈關於革命文學〉，《太陽月刊》2（1928.2）。此處乃轉引自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頁228。

69 魯迅還譯有其他有關馬列主義文藝理論著作。詳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頁232。

言論而妄下定論而已。

魯迅的小說雖不無灰暗，然而錢氏以至於其他攻擊者均不明白其小說之所以灰暗的原因及目的所在。<sup>70</sup> 問題是，他似乎並非從親自閱讀而獲得的感受，而只是抄襲報章上他人攻擊魯迅的文章。從這事例可帶出兩個可能性：1.他撰寫文學史而可能沒有看所評論作家的文學作品，實有違其為文學史而立的宗旨；2.他不看或未看魯迅以及其他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實亦是出於對新文學的鄙薄。對此，石聲淮對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便有如下評價：

錢先生以當時的觀點對那些作家和作品進行了評價。從今天看，那些評價不盡全面和準確。<sup>71</sup>

然而，無論在《現代中國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中，他對古文學作家的論述均有頗多精彩而深入的個人見解。

我們之所以列舉出以上的事實以及標明事件發生的日期，旨在說明錢基博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對魯迅的批評只是人云亦云，其所抄襲的並非全屬事實。另一方面，當時左翼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刊物極多，錢基博隨意抄錄，肆意對魯迅以及他人作出攻擊，至於箇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的鬥爭，非其始料所及。

## 六、文學史方法論

### (一)「比類」、「比次」之法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錢基博對中國文學史的理解與當時的社會與文壇的態勢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我們將探討錢氏如何在其「比類」與「比次」的方法論底下，體現其與現實相涉的文學史觀。

70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參 Tsi-an Hsia, "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un," i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p. 146-162；此外，李歐梵亦曾論及魯迅小說「獨異個人」與「庸眾」之間的關係，可作錢基博對魯迅小說無當於民眾的回應，見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74-93；關於魯迅思想演變，可參李澤厚，〈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國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中冊，頁762-794。

71 石聲淮，〈校後記〉，《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版），頁513。

吳忠匡對其老師錢基博治文學史的方法有如下理解：

他著述《文學史》，自序中稱於章氏書，「少耽研誦，粗有睹見，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有法。」「比次之法」正是章氏所講求，而為先生所著意弘揚的治學方法。<sup>72</sup>

吳氏在錢氏1993年版的《中國文學史》〈後記〉中，再度闡述錢氏在治文學史時所運用的「比類」與「比次」的方法：

……「比類」、「比次」之說，就作家所處的時代環境、政治思潮、社會思想等狀況，著重考察歷代文章的利病與其升降得失的歷史根源，在評論歷代文學理論與其作品的同時，運用排比綜合的方法，揭示它的發展、演變與其流別。<sup>73</sup>

例如，在論及司馬遷《史記》的文章時，錢氏便將之與《左傳》及《莊子》相比較，指出《左傳》以體會經之義理為主，結合事例而予以變化，《莊子》以情事為主，結合事理，寄以幻思奇想，至於《史記》則乃以事理為主，結合情事，而「如雲龍霧豹，出沒隱現，變化無方。」<sup>74</sup>同樣地，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中，特別在「古文學」部分，我們也可發現這套方法的運用，他亦是以這套方法勾勒出整個上承司馬遷而下貫清代桐城派的古文譜系。

至於「新文學」部分，雖亦略及康、梁源於桐城而敗壞其義法，然而較多突出的卻是清末民初的時代環境、政治思潮、社會思想等狀況，或即部分出於受泰納理論的影響，故此書中「比次」或「比類」之方法運用似不及《中國文學史》多。

## (二) 知人論世

「比類」、「比次」可以說是宏觀的方法論，非學識淵博者不能為，而這套方法之應用實奠基於著者對作家生平與文學發展之深切認識，即「知人論世」。相較於「比次」、「比類」而言，「知人論世」或可稱之為微觀的方法論。1986年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在「出版說明」中對其「知人論世」

72 吳忠匡，〈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中國文化》1991.4: 192。

73 吳忠匡，〈後記〉，見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下冊，頁1132。

74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下冊，頁1132。

之方法有如下說明：

……作者因本孟子「知人論世」的宗旨，並不局限於以文論文，就詩論詩，而是緊密地結合當時「朝政國事」，在極其寬廣的背景中，尋求和探討這一時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來反映時代和社會的內容以及這一時期中的政治、思想動態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某些側面。……本書在今天，仍不失為研究文學的歷史發展和近代政治、社會方面的一部重要參考書。<sup>75</sup>

除了文學之外，很多討論錢氏這本《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文章都不忘指出此書可作為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參考書」。吳忠匡亦認為：

本書……是一部廣義性質的文學史著作。……作者的愛憎情感是顯而易見的。本書並不局限於以文論文，就詩論詩，而是在極其寬廣的背景中，尋求和探討這一時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有關一代文人的遺聞軼事，可作為「知人論世」之資的，也都網〔網〕羅，粲然可觀。正如先生自己所評說的：「讀者以此一帙為現代文人之懺悔錄可也」。這說明先生的這一著述，對當時的學術界起了一種不可或缺的深刻反思的作用。<sup>76</sup>

「知人論世」乃孟子說詩標準兩個條件之一，亦即是對作家的背景要先有一番瞭解後，在詮釋作品時，才能更準確地「以言逆志」。然而，正如錢氏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的開始時所言，「考證文學家之履歷」，旨在說明「文學著作」。《現代中國文學史》雖則名之為「文學史」，然而作者或深入人物內心，或徵引他人的書信，以呈現人物的處境，實亦可將之視作為一本繪聲繪影的歷史小說。相較於其《中國文學史》中之偏重「比次」、「比類」的方法，錢氏則較自覺地運用了「知人論世」的方法來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以達至文學史與現實相涉，以體現世變下的文學變遷。然而，過多的關於作家本人的瑣屑記載，可能亦正是此書瑕疵之所在。

## 七、治文學史之意義及其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之目的

### (一) 治文學史的意義

75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2。

76 同註72，頁192-193。

在其《現代中國文學史》的開端，錢氏這樣闡述治文學史的意義：

吾人何爲而治文學〔史〕耶？曰：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爲推已矣。……而文學史者，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sup>77</sup>

在這裡他指出，憑藉文學史，「據往事以爲推」，我們可以得見歷代文學的「演變」，而把握其「動」與「變」之規律則爲「會通」。從錢氏的「會通」角度推斷，將來之文學復興絕不在於以胡適爲首的新文學；相反地，他以「別張一軍」來形容胡適所領導的新文學。而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中，他亦以「別張一軍」相近意思的「異軍別張」<sup>78</sup>來形容明末他所謂「尸亡國之大詬」的以鍾惺（伯敬，1574-1625）與譚元春（友夏，1586-1637）爲首的竟陵派。正如他所謂的「有往必復」、「返古修一」的文學史觀，即變動之後仍歸不變，新文學之出現只是旁枝（偏），中國文學之正統必然延綿不絕，一如中華民族及其傳統文化。

## （二）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之目的

### 1. 由「現代」一詞的定義說起

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既是以「現代」爲限，然而其中所論述的人物大多是滿清遺老，而非新文學作家。其對「現代」一詞的界定，與我們現在的一般文學史對於「現代」的認知，極爲不同。且以以下幾本較爲知名的文學史爲例，以觀一般文學史對「現代」一詞的界定與錢氏不同之所在。

由唐弢（1913-1992）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發端於五四運動，但以鴉片戰爭後的近代文學爲其先導。」<sup>79</sup>黃修己在其《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則認爲：「1917年是文學革命的開始，也是現代文學發生期的開始。」<sup>80</sup>由錢理群等人所合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書則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爲開端，而且對於「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有如下闡釋：

77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8。

78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下冊，頁846。

79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1冊，頁1。

80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頁15。

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sup>81</sup>

以1917年為「現代文學」的開端，雖未必人人同意，但基本上已是當時以至現在的主流意見。錢基博身處五四新文學發軔之時代，且身為文人、學者，在撰寫以「現代」為斷限的文學史，自不可能不對「現代」一詞的涵義有所瞭解。然而，錢氏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所涵蓋的人物當中，冠於「魏晉文」之首而出生得最早的王闔運，生於1833（早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其逝世之時則為1916年，若依上述所引的幾本現代文學史對「現代文學」的界定，則他仍未能活至趕上1917年開始的「現代文學」的頭班車。

事實上，錢氏並非不知道當時對「現代」的定義，否則他不會特別對其採用「現代」一詞而作出如下的定義以及解說：

吾書之所為題「現代」，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於推跡往古者，此物之志也。然不題「民國」而曰「現代」，何也？曰：維我民國，肇造日淺，而一時所推許文學家者，皆早嶄然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甚者遺老自居，不愿奉民國之正朔；寧可以民國概之？而別張一軍，翹然特起於民國紀元之後，獨章士釗之邏輯文學，胡適之白話文學耳。然則生今之世，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斯亦庶矣。治國聞者，儻有取焉。<sup>82</sup>

據以上解釋，他採用「現代」而捨「民國」，乃因為當時文壇所推許的文學家，都是在清末已嶄露頭角，而彼等以滿清遺老自居而不願奉民國之正朔，故不勉強以民國國號涵蓋這一批作家。但問題是，他聲言採用「現代」一詞乃為了方便於晚清「嶄露頭角」的遺老，若依其邏輯而言，則是因為民國以來，值得納入文學史的作家並不多。他解釋，因為民國建立的時間尚淺。故此，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新文學，在錢基博這本以「現代」為稱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並非主流，只是「別張一軍」而已。而且，在錢氏的設計下，「新文學」與「古文學」相區分，不計「緒論」與「編首」，增訂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上編」的「古文學」由39頁至328頁止，而「下編」的

81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前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頁1。

82 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1986年版），頁9。

「新文學」則由 329 至 506 頁。比例之懸殊，錢氏在新、舊文學之間的取舍，視新文學為「動」與「變」之意，可見一斑。

更令人納悶的是，置於「新文學」之下率先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新民體」；其次則是嚴復與章士釗兩人為中心的「邏輯文」；最後乃以胡適為主，附有不大為人熟知的黃遠庸，湊上魯迅與徐志摩，便成了「白話文」一節。說到底，實際此書中有關我們現在所認同的「現代文學」或「新文學」的便只有「白話文」的這一小節，約計二十七頁，而其中不太為人熟知的黃遠庸已佔去數頁的篇幅。

值得一提的是，無獨有偶，早在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問世之前，胡適便曾應《申報》的邀請，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刊登於 1923 年 2 月《申報》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的《最近五十年》之上；而其中他所攻擊的古文學末期的人物恰恰大部分是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中所予以肯定的古文學家。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關於「古文學的末期」一處，胡氏開出以下的代表人物：1. 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2. 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文章；3. 章炳麟的述學文章；4. 章士釗一派的政論文章。<sup>83</sup> 胡適稱：「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而且只是「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sup>84</sup> 可是，除了章太炎古雅的文章、經師的身分以及林紓怎樣也無法擺脫的桐城宗師的身分而難以將他們置於新文學之內，以上所有被胡適稱為末期古文家的，全被錢基博安置於「新文學」的名目之下。由以上種種跡象推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很有可能是參考了胡適的論著之後，因應其攻擊舊文學的方向而撰的抗衡論述。

由此可見，錢氏對「現代文學」的理解截然大異於當時以至於現在的主流觀念。問題是，由上述文字可見，他並非不知道當時對「現代」一詞的定義，而是別有苦心。由「然則生今之世，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斯亦塵矣」一言推論，可見當時言現代文學者必以民國為時間斷限的事實。依其言，並無失當之處，甚至可稱之為有見地。至於具體的時限，則仍有可商榷之餘地。可是「治國聞者，儻有取焉」這句話則值得我們注意。據錢氏記述：

---

83 《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 95。

84 同上註，頁 95。

……於是教育部以民國九年頒「小學課本改用國語」之令；而白話文之宣傳，益得植其基於法令焉。<sup>85</sup>

由此可見，錢氏對於白話文學之盛行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了然於胸的。在1933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竟然給予晚清的古文學以絕大的篇幅，而故意縮小白話文學。入錢氏視野的並非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新文學作家，而絕大部分是古典文學作家。這是妄顧事實的反新文學論述。按《現代中國文學史》出版的三十年代，其時新文學運動已是成果纍纍。1935年由趙家璧主編，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於1935年10月30日付排，1936年2月15日初版出版了十大卷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以展示新文學運動十年以來的實際成績。然而錢基博在1936年增訂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不單沒有改變其對新文學以及胡適、魯迅、徐志摩等新文學作家的觀感，反而大增撻伐之篇幅。其對新、舊文學的態度，判然立現。依上述引言推斷，他可能對教育部所頒行的「小學課本改用國語」之令有所不滿，故而在《現代中國文學史》才有擴闊「現代文學」的範圍，向上追溯，而非依循以民國為開端的新文學主流。而從其以「現代（晚清）」抗衡民國以來的「現代（1917年的新文學運動）」以及其向執政者進言之舉而言，錢氏對於古文學實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緒。

## 2.發憤以抒情

### (1) 文學與世變

錢基博做學問的一個最大的特徵便是著重學問與現實相涉，他認為文學與現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指出：「事異世變，文學隨之。」<sup>86</sup> 這種因「世變」而「文學」的關係貫穿了整本《現代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在「新文學」部分中更為突出，相對而言，這種特色在《中國文學史》中並不明顯；前者乃錢氏有切身的感受，受現實種種變動的發憤之作，而後者則可能乃教材之故而不及詳細論及。當時文學革命正是如火如荼，而他卻認為「尚有老

85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492。

86 分別見錢基博，《中國文學史》，上冊，頁9；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10。

成人」，「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sup>87</sup>「變動不居的」當然是指此書中大篇幅的「古文學」，以與「變」的「新文學」相抗衡。最令錢氏悲憤莫名的便是「新文學」中的康有為、梁啟超與胡適等人的狂言惑世、敗壞國運。他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包羅萬象、變化多端，而最重要的批評是：「桐城義法至有為乃殘壞無餘」；其「恣縱不儻」的風格則為後來梁啟超新民體之所承傳。<sup>88</sup>至於梁啟超，錢氏認為他師法康有為而自成一家，雖承認其文「晰於事理，豐於情感」以及「文學感化力之偉大」，但亦不忘指出老一輩詆之為「文妖」，<sup>89</sup>且其為文亦有「堆砌」、「冗長」與「沙泥俱下」<sup>90</sup>之弊。一言以蔽之，在其眼中，康、梁師徒之文章，都是「變世」之文學，而這種文學亦乃惑亂家國，國運敗壞之根源。

從《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之偏重「古文學」，壓抑與大肆抨擊康、梁之文章以及胡適等人之「新文學」，我們不禁要問，他作此「文學史」，究竟有何目的？在其「四版增訂識語」中，他便道出原委：

我生不辰，目睹諸公袞袞，放言高論，喜為異說而不讓，令聞廣譽施於身；而不自知諸公之高名厚實何莫非億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今吾儕小民，呻吟憔悴於新政之下，疾首恫心，求死不得；末學小生，叫囂跳踉於新學說之中，急言竭論，迷復何日。而諸公聲名日高，慮無反顧。<sup>91</sup>

從這段文字觀之，錢氏之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乃是由政治而文學的。他認為，康、梁等人之倡議「維新」與「變法」，實乃未見其利而已遺害蒼生不淺。此乃基於其信守「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之宗旨，政治體制固然如此，視之文學亦然。瞭解其宗旨，我們便不難明白他何以力詆康、梁（尤以梁啟超為甚，或許出於康有為仍是保皇派）以至批駁胡適等所倡導的推翻舊文學、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以及其所鼓吹的推翻一切舊制。這一切均是嚴復與錢基博這一派保守主義者所引以為憂的。其所作乃效前人之規勸迷途者，而背後所肩負的乃為「袞袞諸公」狂言亂世所殃及的「吾儕小

87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86年版），頁8。

88 同上註，頁330。

89 同上註，頁383。

90 同上註，頁385。

91 同上註，頁511-512。

民」發音，故而落實至發憤著書，代「億兆姓之含冤茹辛」者鳴不平，以《現代中國文學史》作為「現代文人之懺悔錄」，<sup>92</sup> 進入現代文人的內心，代他們執筆，將他們在文學上的創作及其對國家社會的影響盡剖人前。矛頭之所指，首當其衝的，便是康、梁師徒以及胡適在內的「疑古非聖」一脈。

## (2) 現代文人之懺悔錄

由以上的論證可見，《現代中國文學史》乃非一般的文學史。錢氏是這樣自陳其撰《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目的：

舉一世之人徒見諸公者文采炤映，傾動當時；而不知柴棘滿胸，中有難言之隱，捫心不得，抱慚何窮。讀者以此一帙為現代文人之懺悔錄可也。<sup>93</sup>

何以稱之為「懺悔錄」呢？「懺悔」一詞乃源自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懺悔錄》一書。盧梭的《懺悔錄》，英文譯名為 *The Confessions*，蘊含著「在神面前坦白承認一切的宗教性意味」，<sup>94</sup> 而「把自己原原本本的寫出來」，<sup>95</sup> 則是盧梭撰寫其書的動機；方法便是令自己「再度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sup>96</sup> 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既意在描繪一幅「現代文人的懺悔錄」，當然並沒有盧梭的宗教的意味，可是他似乎立意進入現代文人的內心，代他們執筆，將他們在文學上的創作及其對國家社會的影響盡剖人前。然而，這一切均並非盧梭的以「懺悔」為名的「自辯」，而是仿具神力，進入犯罪者的內心，盡錄其犯罪之動機與心態。這是《現代中國文學史》與《懺悔錄》不同之處。

然則，何以錢氏會以此書作為「現代文人之懺悔錄」呢？我們可從陳平原對《懺悔錄》在民國年間文人間掀起熱潮的論述以窺其底蘊：

盧梭在 20 世紀中國，可稱得上「聲名顯赫，影響深遠」。以《懺悔錄》為例，20 至 40 年代，便有七種中譯本問世。其中，1929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章獨譯本，附有大名人吳稚暉、蔡元培的序。周作人 1918 年出版的《歐

92 同上註，頁 508。

93 同上註，頁 508。

94 余鴻榮，〈盧梭生平及其作品《懺悔錄》〉，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余鴻榮譯，《懺悔錄（*The Confessions*）》（臺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21。

95 同上註，頁 14。

96 同上註。

洲文學史》，已開始討論《懺悔錄》的得失；約略同時，吳宓、林語堂則在哈佛大學聽白璧德（Irving Babbitt）講授關於盧梭的專題課。<sup>97</sup>

由此可見，受《懺悔錄》影響而又爲之宣揚的，均乃新文學運動中的領袖。陳平原又指出：

……法國大革命乃是《新民叢報》極爲關心的話題。至於「激進主義」的《民報》之傾心於盧梭與法國大革命，更是意料之中。對於晚清主張改革的政治家——不管是溫和派還是激進派——來說，法國大革命遠比文藝復興更接近於其現實關懷。<sup>98</sup>

而《新民叢報》的主筆梁啟超既是引介盧梭與法國大革命之先驅，錢氏矛頭之所指，首當其衝的，便是梁啟超，至於胡適在內的「疑古非聖」一脈，當然也在「懺悔」之列了。

## 八、總 結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所徵用的乃廣義的文學觀念，這是一部眾所公認的廣義文學史，任何的書寫模式均爲其所挪用。錢氏雖睽離自己的文學史理想，然其「比次」、「比類」以及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所運用的「知人論世」方法，則爲我們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現代」文人圖像，而這一切又是截然迥異於目前我們所見的文學史論述。這正是錢氏所聲稱的作爲「現代文人之懺悔錄」的文學史。

在新、舊文化衝突底下而刻意爲之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堪稱逆流之作，充分流露其崇古意識與深切的現實關懷，雖對新文學運動中人之評價不無偏頗，而一切均乃發自一位傳統文人對傳統與家國之關懷。此文學史爲我們提供了在面對翻天覆地的劇變中，傳統文人的憂懼與不滿，愛憎分明，語調激越，堪稱發憤以抒情之作。而惟有將此書置於當時大環境的時代氛圍，方能理解其真正目的與價值之所在。

---

97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434-435。有關盧梭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可參閱夏良才，《盧梭》（香港：中華書局，1994），頁144-164。

98 同上註，頁335。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李夢陽，《空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明·何景明，〈海叟詩序〉。收錄於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116-117。
- 明·康海，《對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二、近人論著

- 孔慶茂 2000 《丹桂堂前》，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 吉平平、黃曉雯 1992 《中國文學史著作版本概覽》，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吳文祺、陳炳堃、錢基博 1989 《新文學概要·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
-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 1991 《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
- 李澤厚 1999 《中國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 吳忠匡 1991 〈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中國文化》1991.4: 190-198。
- 吳淑鈿 1996 《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 沈衛威 2000 《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臺北：立緒文化公司。
- 林志浩主編 1995 《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周策縱等 1991 《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周中明 1999 《桐城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胡適 1953 《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
- 胡適 1996 《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文化出版社。
- 胡適著，姜義華編 1993 《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
- 胡先驥，〈評《嘗試集》〉、〈評《嘗試集》（續）〉、〈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錄於孫尚揚、郭蘭芳編（1995）《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292-311、312-328、329-350。
- 馬衛中 2000 《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 張朋園 1999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唐弢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收錄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1959）《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卷，上冊，頁21-23。
- 陳平原 1998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郭齊勇 〈試論「五四」與「後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收錄於劉青峰編（1990）《歷史的反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243-264。
- 溫儒敏 2000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修己 1994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
- 楊揚 1999 〈晚清宋詩運動與「五四」新文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9.2: 214-221。
- 樂黛雲 〈重估《學衡》——兼論現代保守主義〉，收錄於劉青峰編（1990）《歷史的反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265-275。
- 錢基博編 1924 《國學必讀》，上海：中華書局。
- 錢基博 1986 《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
- 錢基博 1933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3版）
- 錢基博 1993 《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 錢基博 1996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 1998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余鴻榮譯 1997 《懺悔錄（*The Confessions*）》，臺北：志文出版社。
- 羅志田 1995 〈新舊文明過渡之使命：胡適反傳統思想的民族主義關懷〉，《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6: 72-79。
- Chang, Hao. 1971.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ou, Min-chih. 1984.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 Hsia, Tsi-an. 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yrical Fury: A Study of Qian Jibo's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gon Fung Chan \*

### Abstract

Qian Jibo 錢基博 wrote and revised his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現代中國文學史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led by Hu Shih 胡適 (whose own *History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白話文學史 was a remarkable mileston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s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This essays starts by exploring Qian'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the ideals and methodology of his literary history. Ironically, we find that he failed to live up to his ideals in his work, although such a problem does not lessen the value of this book. Our main concern is how he and other traditional literati like him responded to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Through a study of his book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rrow and the fury of a 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i faced with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literature and moral values and, just as importantl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iews of Qian, a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and proponents of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Keywords:** New Literary Movement, vernacular literature, classical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Qian Jibo 錢基博

---

\* Ngon Fung Chan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